

古史考

第七卷

道统的偶像

海南出版社

古史考

第七卷

道统的偶像

海南出版社

2003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史考/吴锐等编.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11

ISBN 7-5443-1150-3

I. 古… II. 吴… III. 中国—上古史—文集

IV. K2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836 号

《古史考》第七卷 道统的偶像

编 者: 吴 锐

责任编辑: 野 夫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邮购: 100005 北京市东单邮局 69 号信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

010-65135806 13681522126

<http://www.zgzj.org/gushikao.htm>

E-mail: xinchaoshe2003@yahoo.com.cn

印 刷: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73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7-5443-1150-3/K.95

(全九卷) 定价: 1008 元

(Vol.1-9) \$450.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调换

《古史考》编委会

主 编

彭振坤（湖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副 主 编

冉先福（湖北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

谭志松（湖北民族学院副院长）

张永高（湖北民族学院副院长）

王新勇（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

执行编辑

吴 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编 委

彭振坤	冉先福	谭志松	张永高
吴吉炎	郑东艳	王新勇	张芳德
张宏树	陈发喜	高雁军	张升辉
郑学刚	雷 翔	杨光宗	顿祖义
谭国玺	袁艳梅	蔡清万	曹 玲
徐定辉	邓辉煌	王飞霞	谭庆刚
石华富	向吉贤	冯 俐	赖申昊

鸣 谢

我们在编选《古史考》的同时，积极筹划《杨向奎先生全集》已三年，杨向奎先生家乡河北省唐山市政府、唐山市丰润区政府、唐山市车轴山中学为出版《全集》提供了部分资助。《全集》工作最后因故被迫中止，我们借《古史考》出版的机会，对唐山市政府、唐山市丰润区政府、唐山市车轴山中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兰州大学历史系也十分关注支持我们的工作。

《古史考》九卷录排难度大，荣幸地使用了方正集团赠送的方正兰亭字体 GB 版 V4.0、方正兰亭字海 V1.00。

弘扬先哲、推进尖端学术研究是我国伟大的文化传统，谨将上述单位的卓越贡献记入历史，激励后人。

《古史考》编委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淮宁陈独秀先生(1879—1942)

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通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很清楚，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借以建立的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的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这里，并且到处都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

——马克思《资本论》。

前 辈 序

周 汝 昌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吴锐先生的《古史考》若干卷行将付梓,要我为这部新书写几句话,以代序引。我自揆哪有这样资格,实不敢僭越承当。而吴先生致意殷殷之下,辞而不获,遂贡拙言,聊供切磋之资。

辩论古史,自然想到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自我个人的感觉而言,今日理解《古史辨》,已不应拘认于“疑古”一点上,盖“疑古”的目的是要辨伪,伪去而后真来;不必斥之为“虚无主义”——“古史皆伪”或“古本无史”。“疑古”是疑伪,疑伪的精神加上科学性的研考,就能显示出古史的真相究竟何似。不是“史”本身须疑,而是要严斥慎防编造伪史、歪曲真史的一切货色和行为、手段(就在当今,我亲历深感的事,就还有人公然发表伪文,欺蔽世人。可以作例。)是故“疑”者无罪,求真是可师的。宜参“活句”,庶几不致“将活龙打作死蛇弄。”因为,“史”之本体性自在,焉有什么“真”“伪”之可言,是史的作者们的心田和笔墨有真、伪之分,而这个大“分”是须辨明的。

顾颉刚先生的史学与史观史论如何,是一回事。《古史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另一回事。思潮是时代之所萌所滋,并时常加上外来的文化影响。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以古证古,不是孟子早就说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了吗?孟子有“疑古”之思,大约彼世已有“伪史”之流行了。

但也不要忘记: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其感受、思维、创作的“个性”特点,这是不能呆看的,比如中华古史多数上了神话色彩。这不必列入“疑”的范围,中华民族喜爱“诗化”的境界,古史的神话化其实是“诗化”——以诗之美、善而“润色”史的真,共同完成了“真、善、美”的民族精神高层世界。如果将这也批为“不科学”、“宣扬迷信”,那就南辕北辙、牛头马嘴了。

同理,一个伟大民族的学术史,也自有其“个性”。

孔子是乐师出身,他说“君子和而不同”,是以音乐来比喻,说的是大家“合奏”一曲,总的美是个“和”,但绝非弹琴的与吹笙的与击钟的……一百人都是

按那一张死乐谱来演奏的，那已不复是“乐”了！

学术之理，何莫不然。

中华学术要繁荣，不要凋敝枯萎——伟大的民族不允许那么“发展”，也不会是那么一个轨迹。

繁荣需要协力合作，薪传师承是“纵”的，切磋交流是“横”的，只要有学存在，必然是这样进行的。不这样，就是消灭学术。消灭了民族学术，也就消灭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智慧、灵魂。

学术是圣洁的，因此才是崇高的。

学术不容许污染，不容许为个人之私所利用。她应是民族精神气节的展示与发皇。中华民族的社会人文科学的事业成果，永远是人类的珍品宝藏。

吴先生的这个《古史考》工作，值得学术界为之瞩目，为之动心。

清人龚定庵之诗大家最喜传诵的还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齐瘖的窘境，是由于有以致之者；而齐瘖的悲局是“人材”的艰稀。向“天公”呼吁，自然是诗人的口吻，谁也不会当真；那么，谁斫伤了九州生气而使得天公也不再“抖擞”了呢？这个问题值得史学家社科家思索。

吴先生这部书，汇集了丰富的史料，这“史”也转眼成“古”。顾颉刚先生的“辨”，不知是否也还有用武之地否？

若有向我启问者：中华的学术传统之“个性”什么样？我将举一个早已为人遗忘的例子借作说明：晋代夏侯湛为汉武帝时的东方曼倩画像作赞序，其中有云：“……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若乃远心旷度，瞻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夫其明济开豁，包含弘大，陵铄卿相，嘲哂豪将；笼罩靡前，跼藉贵势；……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今日之人，温诵此文，应有所感——这不一定是赞美东方先生一人，实乃指明一种中华学者的造诣和境界。两千年下，群贤莫不以此为努力的标的。这是读《古史考》时也应念及的重要一面。

笔者深慕此义，而多年来求之于域中海外，尚未多逢——逢者历者却大多反是而为之者：不学有术，“专业”是打击别人，茭夷异己，“塑造”自身，欲纳学人于其一姓之家，窃名谋利。若称此类为“史”为“学”，岂不痛哉。悲夫！

目下我们的学术环境气氛一片大好形势，令人振奋，这是“九州生气”的新的“风雷”——这风雷是鼓动阳和，化为万物，而不是毁灭生机。正因如此，回顾一下吴先生的工作成绩，不是温故，更是知新——一把钥匙。

谨将一些杂感略记于此，本不成序，姑以“绪”字代之。谬陋之处，敬希教正。

周汝昌 癸未之春

总 序

彭 振 坤

(湖北民族学院, 恩施 445000)

· 奉献给读者的《古史考》九卷, 是湖北民族学院组织的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 是建国以来关于中国古典学的专题论文集。目前所收论文的起止时间为1949—2003年。文章入选的标准可分三类:

(一) 中国上古史, 以先秦两汉(尤其是先秦)问题为中心。

(二) 中国上古史的影响延续至后代者, 如民族、道统、宗教等问题。

(三) 对古典学不同的解释立场、方法, 如胡适思想批判、文化保守主义等。

第一卷“批胡适甲编”、第二卷“批胡适乙编”、第三卷“批胡适丙编”、第四卷“批胡适丁编”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这些以20世纪50年代为主的批判性文章, 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 理应成为我们民族多难兴邦的公共资源; 知识分子对敌我的区分, 体现了他们的纯朴性, 不应当苛求。

第五卷“古典学方法”以建国以来重大史学思潮为中心, 如古史辨、“走出疑古”等问题。

第六卷“帝系的偶像”以古代族系及对近现代的影响(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为中心, “帝系”即族系。第七卷“道统的偶像”以古代道统、正统问题为中心, 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提出打倒四个偶像, 其中两个是帝系、道统, 《古史考》第六、七两卷就是按这一思想编选的。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权、王权为中心, 涉及国家起源。

第九卷“民间论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的起止年代、文明起源为中心。

古史者, 民族之遗产, 学术之公器, 可以考, 可以辨, 可以走进, 可以走出。东汉王充“疾虚妄”, 著《论衡》。蜀汉时期, 谯周著《古史考》, 多为道听途说, 已佚。唐代刘知几著《史通》, 有“疑古”、“惑经”等篇, 已是开宗明义。宋代怀疑主义兴盛, 苏辙为改写《史记》, 著《古史》六十卷, 上起伏羲三皇, 下至秦始皇, 殊少创意。清代崔述著《考信录》, 成为中国、日本怀疑主义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华民国时期爆发的古史辨运动, 以1926—1941年出版的《古史

辨》一至七册为标志，共汇编了 350 篇文章，合计 325 万字。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将它定义为“中华民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汇编’”。他在 1943 年有编辑八至十八册的计划，没有完成。他在 1930 说，《古史辨》本是辑录近人著作，正不须使它有系统。他曾设想，在《古史辨》之外，再作两种书，一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后者是“提出若干较大问题，作为系统的研究”，当然是有系统的。可惜这两种书都没有完成。

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编的《古史考》不可能同于前人。以民国时期的古史辨运动来说，它之所以能形成一场运动，在于它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这一理论其实不能简单地用“疑古”二字概括。建国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发现突飞猛进，相当多的人盲目乐观，时值 90 年代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于是有人因势利导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由于“疑古”的背后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作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技术操作上都不可能走出，因而也形不成“走出疑古运动”，《古史考》第五、九两卷有多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现在的《古史考》还提不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可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席前人之成业，占时代之优势，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将来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也未必不可能。

本书的编辑，归功于海内外作者的大力支持。很多作者对这项工作“表示敬意”，有的作者认为我们的工作保卫了史学的“纯洁性”，国内老前辈甚至以“继绝学”相勉，国外老前辈盼望我们的书“盛大刊行”。在此要特别感谢文坛名宿周汝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煦华先生、海南出版社总编袁大川先生。《古史考》的编辑还得到下列名门之后的大力支持，他们是：钱端伟先生（钱玄同先生之孙）、安可行夫人（王献唐先生儿媳）、杨永贤女士（杨向奎先生之女）。编选、奔走之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先生和我校王新勇先生承担。责任编辑野夫先生是我校新三届校友，为把母校的成果推向社会，他做了很多工作。学术的涓涓细流，需要继承，需要弘扬。帮助我们的人难以一一列举，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前，为把我校建设成为中国古典学、民族学、民俗学基地，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这次推出的《古史考》，努力成为中国古典学的集大成之作，能否达到这样的高度，还希望学术界批评指正。

本书付印之际，时逢建国 54 周年，而我们所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即将迎来 20 岁生日，谨以此书作为献礼！

2003 年 11 月

继续征求著作权人和继承人

《古史考》转载的论文的时间跨越 54 年，其中第五至九卷的作者，基本都有授权。有位老前辈给我来信说：“（我）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你们要用只管用，因为每一个作者的心理大概都是希望扩大流布的。”一位作者来信说：“你所选择的事业，于学林大有益处，然而工作难度之大，亦可想见。若非有极大热情和毅力，是难以完成的。为此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像这样的慷慨授权还有许多。

唯第一至四卷的论文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主，作者绝大部分都已谢世，我们联系了一些尚健在的作者——他们都是当今顶级名流，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从他们赐赠的书籍来看，他们中有的已将当年的大批判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中，可见他们并不讳言当年的言行。有位老前辈鼓励我说：你收了我的文章，也使我自己看看年轻时走过的路。“五十年代的作品对我来说，也是反映当时时代思潮的一个轨迹。”这种大师风范，后辈唯有敬佩。我们编选《古史考》一至四卷的目的正是为时代思潮存档。批判胡适运动，很明显是国家行为，不应怪罪参加者，理应成为我们民族多难兴邦的公共资源。我们尽可能多地联系了已经故去的作者家属，也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如有一位名门之后不仅同意编选父辈的文章，而且放弃稿费，并说：“请作为说服出版社接受该选题的一点助力”。当然，凡作者或家属不同意再次转载的，我们都没有选。

《古史考》第五至九卷转载《战略与管理》多篇文章，经与黄钟先生接洽，征得了该刊的同意，非常感谢。除李慎之先生外，其余作者无法联系。

本来，出版社对于出版没有完整授权的书很犹豫，但作为研究者，我们很希望及早推出成果，也为学术界提供资料的便利。凡《古史考》涉及的版权、著作权等问题，都由本书编者负责。凡我们没有联系上的著作权人或继承人，请与本人联系，以便邮寄样书并协商相关事宜。与本人联系的方式是：

通信地址：100732 北京建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mail: xuanku03@yahoo.com.cn（请注意“03”是阿拉伯数字）

电 话：（010）85195831 传真：（010）65289528

再次对作者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锐 敬启 2003 年 11 月

目 录

上编 黄帝一元正统史观再认识

- 一 夏商文化是二元还是一元
——探索夏文化的关键之二 2000 年……………郑 光(1)
- 二 《尚书·尧典》与古史研究小议 2000 年……………葛志毅 李士龙(15)

中编 正统与道统

- 三 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 2000 年……………关增建(29)
- 四 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1999 年……………方立天(45)
- 五 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 1992 年……………何德章(59)
- 六 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 1993 年……………陈学霖(73)
- 七 宋朝“火运”论略
——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1997 年……………刘复生(105)
- 八 正统观与金代文化 1990 年……………宋德金(121)
- 九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1996 年……………江 湄(137)
- 一〇 元代的白莲教 1983 年……………杨 讷(147)
- 一一 白莲教的反元运动 1985 年……………戴玄之(179)
- 一二 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
政治化的“道德观”1993 年……………黄进兴(201)
- 一三 “正统之争”与“正统史观”1988 年……………孙家洲(225)
- 一四 论中国历史上“正闰观”的文化意蕴 1994 年……………周庆智(237)
- 一五 “道统”抉微 1991 年……………唐宇元(251)
- 一六 说伪《古文尚书》经传之流传 1993 年……………程元敏(263)
- 一七 伪《古文尚书》与宋明理学 1997 年……………李耀仙(283)
- 一八 焦循父子《尚书》学综述 2000 年……………赖贵三(295)
- 一九 “正统”与“异端”
——以清初的经典认同为例 2000 年……………林启屏(307)

- 二〇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道统思潮 1991 年 李良玉(343)
- 二一 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
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2000 年 罗志田(355)
- 二二 合法性与中国政治 2000 年 张 健(369)

下编 郭店楚简与新道统

- 二三 《礼记·中庸、坊记、缁衣》非出于《子思子》考 1999 年
..... 程元敏(391)
- 二四 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
——儒学传统新诠论纲 2000 年 姜广辉(423)
- 二五 试论郭店楚简各篇的撰作时代及其背景
——兼论郭店及包山楚墓的时代问题 2000 年 王葆玟(441)
- 附 郭店竹书时代新证 2003 年 王葆玟(455)
- 二六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之研究 2000 年 池田知久(467)

· 附录一 ·

- 试论中国文化自恋倾向的起源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五 2000 年 吴 锐(535)

· 附录二：中国古典学研究动态 ·

- (一) “王献唐研究”项目成立…………… (104)
- (二) 古文献信息处理技术——方正超大字库及输入法
…………… (178、224、236)
- (三)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于2003年9月出版…………… (306、342)
- (四) 顾颉刚、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即将出版…………… (354)
- (五) 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将出16开横排新版…………… (354)
- (六) 《四库家藏》将于2004年1月出版…………… (354)
- (七) 《中国古典学》将创刊…………… (368、466、534)

《古史考》第五至九卷凡例

- 一、第五至八卷收录1949—2000年之间的文章，第九卷收录2001—2003年之间的文章，绝大部分是转载已经发表过的。
- 二、目录中文章标题后的年月日是指文章最初的发表时间。文章编排的顺序大致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兼顾内容类别。
- 三、除个别文章外（如第七卷池田知久文），（）前面的字表示是《古史考》编者判断的错字，（）里的字是《古史考》编者改正的字。
- 四、《古史考》所有文章的标题均位于奇数页，为了减少空页，一些偶数页的行距进行了压缩。

夏商文化是二元还是一元*

——探索夏文化的关键之二

郑 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据传统的史学观念,夏商的主体民族、主体文化是同一的,一脉相承的。自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疑古派的“古史辨”运动以来,中国古史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夏商的主体民族由原来的同一民族变成了两个民族,主体文化变成了两种文化。经过一阵扰攘,人们对已被否定的古籍和古史失去了信心,只有通过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了解古史。有的学者根据夏商统治者主要活动或遗迹的地域,把夏文化与当时主要发现于晋南和豫西的仰韶文化联系起来,将商文化(小屯文化)的上源与当时主要发现于山东和河南东北部的龙山文化联系起来;有的学者从民族感情出发,把本土文化——殷商文化及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与普遍认为的西来文化——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对立起来。结合历史的夏西殷东对立说,有夷夏东西对立说。考古学上的彩陶黑陶二元对立说,历史学上的夷夏东西、夏殷二元论,在学术界相当长的时间内居于统治地位,影响巨大而深远。直到 50 年代后期,由于龙山早期文化的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传承关系以后,仰韶龙山二元论才宣告破产。随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将龙山文化与商文化连成一体,此说更无存在的根据了。可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夏商二元论仍稳据宝座,至今依然左右着中国古代史观,它成了先秦历史和考古的核心观念之一,成为考古学文化属性判断的出发点和前提。要知道这种观念和前提是否正确,还得追根溯源,正本清源;要推动我国历史学和考古学进一步发展,要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要弄清夏商文化的关系,解决夏商二代的分界所在,特别是正确理解、研究夏文化和夏史,还得超越疑古,走出迷茫,走出二元论。

* 原载《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 3 期。

一、二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至今仍称我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是炎黄子孙（即自炎黄以来，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根据什么呢？这当然是根据传统的古史记载（包括先秦的经、史、诸子等）。在传统古史里，夏商或夏商周本来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然而时代在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在变化，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压迫、欺凌侮辱，沦为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被摧垮。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除少数洋奴买办忠实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以外，大多数爱国热血之士，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广泛吸纳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将传统文化与中国旧制度完全等同起来，在摧毁旧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要摧毁旧的思想文化，直捣其核心“孔家店”。有的人出于一腔热血的冲动，或因盲目崇拜西洋文化，或因对西方列强和日本诬蔑、贬低中国历史文化的论调及其险恶用心认识不清，因而受其影响。以为中国贫弱落后，挨打受辱，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还因旧文化带来的历史包袱，祖先的罪过，便自己贬损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甚至悲叹自己民族衰老或不良。一时间，反传统主义、疑古思潮风起云涌，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阴风阵阵。凡有违此者，被视为封建卫道士。国际国内的大环境酿成的这种反传统思潮，本世纪初叶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内，势力极为强劲。以至中国古代文明被否定，造成普遍对传统文化信仰的崩溃。

20 年代疑古派之疑古辨伪运动，在上述政治、思想环境下，要彻底打破旧的传统，矛头主要指向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竭力要把它们和古史、古书统统送进封建博物馆，要割断古今，“让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①。他们彻底破坏了传统的古史系统，中国五千年或四千年的历史被缩短了一半，认为“东周以上无史”^②。顾颉刚还提出四个打破，其中头两个是：打破民族的一元观，打破地域的一统观^③。这样一来古史被破坏殆尽，从而形成一种混乱局面。一个统一的华夏族被分裂为许多不同民族，如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等；中华帝国统一的九州疆域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如夏商周秦等“民

^①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 年，第 28 页。

^②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 年），《古史辨》第一册（192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 年，第 35 页。

^③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 年，第 99、100 页。